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专访中国社科院欧洲所所长黄平

玛　雅

访谈时间:2015 年 6 月　访谈地点:武汉

中国梦贯穿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

玛雅:中共十八大确定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也就是中国梦,即在建党一百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你对这个问题如何理解?

黄平:讲中国梦首先应该回到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上来。中国梦是新一届党中央确定的目标,同时也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它是和我们国家走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走到今天、我们的人民走到今天联系在一起的,也是和下一个 30 年我们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愿景联系在一起的。

玛雅:也就是说,中国梦贯穿中国的过去、今天和未来,折射出中国道路的延续性。

黄平:是的。2009 年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的时候,我当时说,我们其实有“三个 30 年”——从 1979 到 2009 改革开放这 30 年,这之前 1949 到 1979 新中国的前 30 年,还有再往前 1919 到 1949 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这 30 年。

这三个 30 年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为历史是不能割裂的。因此,要认识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中国,就需要认识前面两个 30 年。换句话说,为了认识中国今天的巨大发展,就要知道在前面两个 30 年里,中国是怎么走过来的。

玛雅:我记得你当时用了一个通俗的表述:在这几个 30 年,中国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解决“挨打”、“挨饿”和“挨骂”的问题。

黄平:对。1919 年以后,中国面临的任务是怎样赢得独立解放,改变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任人宰割、不断挨打的命运,这个任务到 1949 年完成了。在这第一个 30 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通过武装斗争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在 1949 – 1979 这第二个 30 年里,新中国通过发展经济、科技、教育和国防,守住了来之不易的独立主权,确保不再“挨打”,同时艰苦而努力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着力解决“挨饿”的问题。1979 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发展提高,到 2009 年改革开放 30 周年时已初步实现小康,近代以来“挨饿”的问题也解决了。

纵观这三个 30 年,如果只解决“挨打”的问题,那只是意味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还要发展经济,解

收稿日期:2015 – 11 – 28

作者简介:黄　平,男,四川成都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中国与全球化。
玛　雅,女,北京人,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新闻写作重点为中国政治与中国国家战略。

决“挨饿”的问题，我们才能站得住、站得稳。1979 – 2009 改革开放这 30 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不仅连续多年实现了高增长，经济发展走在了世界前列，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的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自己的奋斗步入了小康。

现在，我们又进入了第四个 30 年。这个新的 30 年将是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 30 年。这个伟大目标是在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迁，以及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个大背景下提出的中国梦，将是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自信。

玛雅：如果说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在第四个 30 年，中国的任务就是解决“挨骂”的问题？

黄平：可以这么说。中国今天面临的任务和 1919、1949、1979、2009 都不一样了。虽然两岸还没有最终实现统一，与个别国家的领土问题还没最后解决，但是自孙中山那代人以来就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挨打”的问题解决了，“挨饿”的问题也解决了。在今后的 30 年，中国人民不仅要站得稳，而且要站得高。就是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之日，也是我们不同于西方的中国道路得到世界的认可和尊重之时。这个任务，就是解决“挨骂”的问题，或者说，就是要确立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2009 年我应邀到欧盟一个组织介绍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10 分钟的发言时间，我只讲了不到 3 分钟，其实就说了一句话 “中国 10 亿以上的人口，在 30 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接近两位数的平均增长；其间不仅实现了 3 亿多人脱贫、2 亿多人非农化、1 亿多人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荡和革命，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对外移民和殖民、侵略或战争，这是自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玛雅：与西方大国崛起暴力血腥的历史相比，中国用那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就，可是我们至今还在“挨骂”。

黄平：所谓“挨骂”和中国梦也有直接关系：中国人不但要站起来，还要站直、站稳、站高。1949 年我们站起来了，但站起来了还要解决发展问题；1979 年以后我们发展起来了，但发展起来了还要解决正当性问题。就是说，中国人不但要活，还要活好；不但要活好，还要活得理直气壮，活得天经地义。而不能是中国今天发展了，反而被别人看不起，被妖魔化，或者被视为“异类”。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解决“挨骂”的问题，绝不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向别人求饶，在价值和制度层面缴械投降，而是要向世人证明中华文明本来就有的正当性，让世人看到和认可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玛雅：就是说，中国不但要崛起，还要为中华文明正名。纵观人类历史，最普遍认可的正当性是历史正当性。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延续和文化传承，是我们最大的正当性来源。

黄平：说得对。我们这么一个国家，我们这么一个民族，我们这么一个文化，经过三十年、三百年、三千年走到今天，成为一个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中华文明。这个文明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之所以能从古到今一直走下来，而且在最近 60 多年发展兴盛，一定有它自己的内涵、自己的道理、自己的力量在支撑着它、推动着它。这不是简单地说这个文化好不好，或者什么人喜欢不喜欢它的问题。而是说，从社会发展、文明传承的脉络来看，我们要知晓，而且要让世人知晓，什么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东西，其中哪些是能够被人分享，也应该被人尊重的。

这就是解决“挨骂”的问题，也是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就不只是政治上独立、经济上小康，还要在文化上证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支、一脉，中国人这么想、这么活、这么走，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别人不一定这么想、这么活、这么走，我们也绝不会强迫别人这么想、这么活、这么走。但是他们也得承认，而且要尊重，中国人的想法、活法、走法，也是人类文明和发展的一种想法、一种活法、一种走法。即使用一个谦虚的说法，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华文明，至少是世界文明和发展的一个途径、一个选择、一个体系。

中国道路的逻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玛雅:中国梦目标提出后,有人解读说,中国梦就是通过先和中国历史“接轨”,实现百年复兴梦想,然后再“并轨”,像美国梦那样,人人分享繁荣,实现个人价值。言外之意,中国梦无非是绕个弯子,最终还是要走美国的路。

黄平:这种解读,可以说对中国道路的逻辑还没弄懂。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别的干扰和破坏,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不仅是第一性的,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可以用指标和数据来衡量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原本也是顺着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脉络走的。

但是走着走着就到了晚清,西方入侵使中国遭遇到强烈的冲击,所谓“千年未见之大变局”。那个时候,就有了技术救国的口号。为了发展技术,就需要兴新学,所以也有了教育救国论。当时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最初到英国是学造船的,孙中山,还有鲁迅、郭沫若,去日本是学医的。包括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最初都选择了改良道路,或是技术救国、教育救国的路。

然而,事实证明技术救国、教育救国的路走不通。为什么走不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晚清社会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甚至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当时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完全没有能力应对来自外敌的严峻挑战,也没有能力应对来自内部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挑战,再也统治不下去了。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自然历史过程”来发展,即先发展经济,首先是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改变生产关系,然后“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

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成为桎梏,而是生产力被阻碍得再也不能发展。这个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因此,近代中国发展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首先革命,赶走侵略者,推翻旧制度,建立新政权,然后才能回过头来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

玛雅:从这个意义说,中国道路不但没有遵循西方道路的逻辑,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所突破。

黄平:近代中国的道路是一条革命的道路,即首先通过革命改变社会性质。这是由中国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性质和特点决定的,而不是一个主观选择。严格地说,我们是被逼出来的。我们一开始也想循规蹈矩,靠技术、靠实业、靠教育来救国,可是都没走通,不得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但是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不同,由于没有现代大工业和庞大的城市工人阶级,我们走不了城市武装起义的路,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所以中国革命的性质只能是农民革命、土地革命,是通过革命来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又由于一方面农民缺乏组织,另一方面却面对无比强大和残酷的内外敌人,所以只能先搞政治革命,而且是武装革命来解决独立和主权、政权和制度的问题。用斯大林的话说,“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这一点,毛泽东在上世纪 30 年代就看清了。所以他不信教条,“反对本本主义”,从实践乃至失败中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条道路从井冈山时期开始摸索,写成系统的理论文章是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以后,在延安形成了系统化的毛泽东思想。也可以说,延安道路是井冈山道路孕育出来的。当毛泽东把中国革命定性为土地革命,因此革命的主力军只能是农民的时候,他真正看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

在这样一个社会,所谓中外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社会环境如此不公,已经不可能是经济基础变化在先,只能是政治革命在先。而政治革命是以思想革命为先导,也就是中国式的启蒙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政治革命又迅速转变为军事斗争。为什么中国没有搞多党制、议会制那套?或者说搞了那么几天,像一场场闹剧一样,很快就转入血与火的军事斗争?背后就是这个逻辑:农民太多太分散,

对手太狠太强大，不通过武装斗争无法解决土地问题，不反抗侵略者无法解决“挨打”的问题。

玛雅：我们说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称之为“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准确说，这其实是中国革命的逻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

黄平：这个逻辑，既不是俄国城市道路的逻辑，也不是英国“自然历史过程”的逻辑。中国革命的逻辑，是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建立人民政权，然后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再回过头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显然，这个逻辑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包括马恩列斯的本本，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洋本本、西本本规定的那些“逻辑”，20 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个样子，中国和亚洲的今天也不是这个样子，那就只能在“自然历史过程”里慢慢爬。

有时候我这样想，马克思如果来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中国革命的实践，像他这样高明和深刻的思想家，也会得出和毛泽东同样的结论。马克思晚年在写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越来越大

玛雅：中国从古到今一路走来，经历了几千年的岁月变迁，经历了近代以来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经历了新中国 60 多年来奇迹般的巨大发展。你认为，今天的中国该如何定位？

黄平：从比较视野来看，中国不只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汤因比曾说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现在马丁·雅克也用这个概念。我认为，中国至少在五个层面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

第一是经济层面。中国是一个大陆型经济（continental economy）。一个大陆型经济和一个国家型经济（national economy）不是一个概念。首先，大陆型经济本身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很强的互补性，因此也具有相当的自我修复能力。为什么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模型到了中国大都不管用？各种指数，比如失业率多高、通胀率多高就会如何如何，到了中国都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按照许多“经典”模型中国经济早就不知道崩溃多少次了，却一直没有崩溃，反而还在不断发展？就是因为大陆型经济本身具有多样性、互补性，所以具有承受风险的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它不能简单等同于或化约为现代经济学所依据的国家型经济，因此用来解释国家型经济的各类模型不足以说明它，更不足以预测它。比如，中国没有走西方福利国家的路，而是通过家庭经济（household economy）和非正规就业（informal sectors），包括妇女劳动，既解决了大量的就业，也提供了相当的社会保障。这样一种潜在的能力所具有的互补性，是非大陆型经济不可能具备的。

其次，这样一个经济体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不是政府该管多点还是市场该管多点。它中间有无数过渡性的层次——省域经济、县域经济、社区和家庭经济。有人用过一个词，叫 provincial China（省域中国）。意思是说，要理解中国，一方面它是一个 continental China（大陆中国），一方面它又是一个 provincial China，有无数个省、区、市。事实上，很多时候其实是县域中国。这种区域多样性使得它在经济意义上也是多元的，所以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调解国家与社会的矛盾时，就不是简单的二元，哪个好哪个坏，哪个管多哪个管少，哪个进哪个退那么简单。

玛雅：就像潘维老师说的，西方的两分法——国家与社会、市场与计划、民主与专制，根本无法解释东西南北差异巨大的中国。

黄平：两分法比较简单，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它忽略了两级之间还有无数的中间环节，看不到两级之外还有更大的空间，所以不能认识复杂的现实，不能处理复杂性（complexity）问题。冷战结束后，两分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再度盛行起来——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社会与国家、市场与政府，等等。而且前者一定是好的，后者一定是坏的，甚至提到善与恶的价值高度。其实这是非常简单化的。

第二是国家层面，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国家有所不同。中文“国家”这个词可以对应英文好多词汇：

state,government,country,nation,等等。但中国作为一个原发性的文明体,甚至不只是“文明型国家”,它的国家形态不仅是政权和政府,也是社会组织形式,还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场域和空间。这样一个文明体是西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的“民族型国家”理论远远不足以解释的。我们的国家形态比那个早得多、复杂得多,所具有的功能也多得多,包括一直就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功能。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二战”以后才建立的,但是用西方的福利国家、社会保障来看中国,就看不到它所一直具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

玛雅:我们的“大同”思想两千多年前就有了,远在西方的福利社会之前,也更为理想。

黄平: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层面——历史。中国是一个活着的历史。它不只是五大文明中没有中断过的一个,它的很多东西今天仍然还活着。长幼尊卑、诗书礼乐、琴棋书画……作为一种文化延续了下来。这个活着的历史不光是在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当中,连乡下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是按古代先哲的道德伦理来处理家庭和邻里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一个一直生活在历史中的社会。

第四是文化层面。中国文明是多种文化共生共存共融的,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学习性、包容性和开放性。有些人把它仅仅归纳为儒家文化并不准确,而且汉族和其他民族也是一种交织共融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也不能和西方的民族国家相提并论,或者和后来按照西方民族国家架构建立的其他大小国家简单类比。这样说不是自视清高、自以为是,它的确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简单类比会搞出许多笑话,也让很多所谓的“中国研究”不得要领。比如有人说,中国既没有哲学也没有宗教,就是把不可比的东西简单排列再简单类比了。

最后还有第五个层面,就是所谓 size matters,规模效应。《红楼梦》里说“大有大的难处”,其实大也有大的好处。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给台大学生讲课,特别讲了大陆因为规模之大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

玛雅:朱老师的话既风趣又实在。他跟学生说,理解大陆时,有三件事你要记得:第一是中国非常大,第二是中国非常非常大,第三是中国非常非常非常大。“大”可能是负担,但也可以变成巨大的优势。今天全世界的跨国公司没有不挤破头要进入中国的,先来插个旗,占个位置。连美国排名前 50 位的大学校董们都说,“我们学校有什么大中华战略(greater China strategy)?”这个问题必须回答,回答不出来,就意味着你的学校在 21 世纪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规划。

黄平:再比如“三个自信”,有人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还差得远呢,再大的成绩用 13 亿一除,人均也在世界几十位、上百位以后。但是这个话反过来说也可以,再小的成绩乘以 13 亿,就是了不起的成绩。每个个人哪怕只提高了一点儿、只改善了一点儿,13 亿加起来,对综合国力的提升、对周边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就是惊人的。一个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口的国家再怎么提高再怎么改善,一时半会都很难有这样的效应和影响,虽然可以在联合国的排名中非常靠前。

玛雅:中国崛起本身就说明 size matters。就像张维为老师所言,18、19 世纪,当英、法、德等国崛起,其人口是几千万级的;20 世纪崛起的美、日等国,其人口是几亿级的;而在今天,21 世纪中国的崛起和复兴,其人口规模是十亿级的,比此前崛起的大国人口总和还要多得多。

黄平:所以邓小平讲综合国力,所以他当年讲中国特色是理直气壮的。管你美国模式还是苏联模式,“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结论”。但是现在有些人却从字面的意思出发,把“中国特色”说成了中国仅仅是个例外,是个案而已。好像我们偏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偏离了所谓的“普世道路”,是个“异类”。如果是这个逻辑,那就没有正当性,也无法建立文化自觉和自信。从上述五个层面看,中国哪里是个案?哪里是偏离了主流的例外或“异类”?

我曾经用牛顿的语言和标准来说中国道路:世上任一事物,如果它跨越的时间越长、覆盖的空间越大、涉及的个体越多,那么很可能,它所包含的普遍性就越强。把这个命题再延伸一下,把中国道路和英国道路、中国经验和英国经验加以对比,你说哪个跨越的时间长、覆盖的空间大、涉及的个体多?中国道路究竟是个例外,还是具有更强的普遍性,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们的文化自信也早应该更坚定。中国道路非但不是个案,而且它的普遍性越来越大。将来到了“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的一天,它的普遍

性还会更大。

中国道路的正当性毋庸置疑

玛雅: 中国人经过百年奋斗,从西方列强的压迫下站起来,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富起来,一个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历程中,我们经受了多少苦难,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这个苦难辉煌的历程足以证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

黄平: 即使不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用玫瑰色去描述中国革命的英勇悲壮——事实上确实很英勇、很悲壮,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也是毋庸置疑的。中国社会孕育发展到今天,成为一个大陆型经济、"文明型国家"、活着的历史、多元的文化以及它巨大的规模效应。几千年一路下来,中间虽有曲折,有弯路,有失败,有教训,但是中华民族没有消亡已经是个奇迹,今天居然还在不断繁荣,走向复兴,就更是奇迹中的奇迹。中国近代以来的这场社会大变革——革命、建设和改革,它在三个 30 年中改变社会的广度和力度,远远超过了马克思当年所关注的英国和西欧。

也许再过 30 年,到 2049 第二个一百年的时候会看得更清楚,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只是经济增长了多少,人均收入翻番了多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过去三百多年来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为蓝本,其他国家只能模仿、追赶,甚至跪在地上叩头,不断祈求拜西方为师这样一个过程。中国崛起的最大意义是,与新中国几乎同时或先后独立的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大都想按照西方模式来发展,但几乎都没有真正发展起来。个别的起来了,但要么是很小的城市型国家,要么是在冷战时期特殊的国际环境下发展起来的,有的至今还没有真正获得完整的主权和独立。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国不是一个偏离主流的个案或特例,更不是什么"异类"。因此也不能说,西方模式是适合西方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只是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太特殊。客观上,如果一种制度及其背后的文明、历史和规模,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发展如此之快,让十几亿人摆脱贫困,进入小康;而另一种制度搞了三百多年,其间经历了那么多战争、侵略、殖民、破坏,才解决那么少一部分人的现代化,而且走到今天,非但解决不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连自身的财政、金融、就业、福利也越来越支撑不下去了,那么这两种制度,究竟哪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呢?即使是马克思理论所依据的英国,它所走过的"自然历史过程"究竟有多大的代表性,又有多少"自然历史"性呢?

玛雅: 与西方模式相比,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更具有借鉴意义。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只是盯着中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中国制度就没信心。

黄平: 不否认中国今天面临各种问题,有的还很严重。比如所谓"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养老。再加住房,有的年轻人好不容易读了博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工作,却感到"买不起房、结不起婚、生不起孩子"。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经验层面可以罗列一大堆,从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到官员腐败、司法不公正,到最后就是中国即将崩溃。但你要是看中国如今一路走来的这个势头,你的认识和预期就会很不一样。

玛雅: 你说的"势头"是发展势头?

黄平: 这是直观的一面,更深层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中国道路的正当性。从世界历史看,通常一个古老文明一旦衰落了,它也就灭亡了,最多是进入博物馆、纪念馆了。而中国不但是唯一一个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明,它还是唯一一个有"凤凰涅槃"之幸的国家。1840 年以后眼看着就要衰落了,到了 1949 年它居然又再生了。1949 年以后新中国一步步往前走,也有过似乎快要不行了的时候。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都付出了很大代价,至今还有很多人在诉苦、控诉,特别是对反右、文革、大跃进的批判。但是它居然又起来了,如今还走在了复兴的大路上。

再看看英国革命、法国革命或美国革命后的前 30 年是什么样子,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付出的代价而如丧考妣、如断脊梁。西方到了 20 世纪还经历了两场世界大战,那是什么样的代价呀!如果再加上生态的代价、道德的代价,按照"控诉"的逻辑,那早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制度不但是马克思分析的剥削、剩余价值、不公平,它甚至把腐败也制度化了,让权钱交易合法化。而在中

国,大小贪官们再贪,包括最近揭出来的“大老虎”,也只能偷偷摸摸干,因为见不得人。几千年的道义在这儿,谁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贪赃枉法马上就成了过街老鼠。而这至今都是我们的正当性的道德之源。

虽然今天有那么多的问题,可是绝大多数中国人很正面地评价我们的时代和未来。这方面的调查很多,而且不是我们自己做的。皮尤中心一年又一年的调查发现,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现状的满意度是最高的,对未来发展的预期值也是最高的。怎么解释呢?第一年这样,他可以说是共产党在忽悠人民;第二年还这样,可以说中国老百姓太愚昧;第三年再这样,可以说统计数字不准确。但是不可能老是这样,持续多年一直都这么高,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那就要有更深的解释了。

玛雅: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中国人的满意度为什么这么高?

黄平:之所以这么高,绝对不仅仅是因为生活水平的改善,经济因素在起作用,这恰恰说明中华文明的生命力和中国道路的正当性。老百姓不是傻子,如果说这条道路、这种制度、这个文明不行,没有基本的正当性,那它根本维系不下去,老百姓早就把它推翻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为什么迟迟没有改旗易帜,实现西式的议会制、司法制、新闻制?一定是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个诉求,不想改变现存的道路、制度和文明。我们说,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也体现在此。如果人民群众不满意、不拥护、不支持,根本不用等什么势力来发动,等什么公知来煽动,早就改变了。反过来,如果人民满意、人民拥护、人民支持,再发动再煽动也没用。

玛雅:史天健老师调查发现,超过 80% 的中国老百姓认为民主比专制好,并且认为中国的民主供给相当高。但是中国老百姓要的民主是民本主义——政府要为人民服务,决策要回应民众需求,而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制、议会制。

黄平:一定是这样的。史天健的调查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那几年做的,要是今天去做结果会更有意思,也更能说明问题。一般来说,“每个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共产党宣言》)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文化需求、政治需求就会提高,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中国亿万老百姓压根儿不认同我们的道路、制度和文明,真的对西式民主有需求、有追求,以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早就闹自由、闹选举,甚至“闹革命”了。为什么“颜色革命”在中国闹不起来?不是外力不够,而是人民群众压根儿没兴趣。

中国文化是一种更高明的哲学

玛雅:这也是西方人最不能理解的。他们认为,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中产阶层日益壮大,中国必然会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形成社会与国家高度对峙,结束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他们后来发现,他们这是一厢情愿。用斯特凡·哈尔珀的话说,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及大批中产阶级的出现,在事实上鼓励了共产党一党执政,使之合情合理地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保障。

黄平:表面看他们是一厢情愿,内心里是不愿意做“平等待我之民族”,总想把自己的一套对外输送,强加于人。这背后的认识论原因就是二元论。西方的启蒙运动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树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等进步理念。但是启蒙认识论背后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二元论——未来与过去、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科学与谬误、民主与专制、社会与国家、市场与政府……而且还上升到价值和伦理的层面,前者一定是好的善的,后者一定是坏的恶的。评判一个制度,还没认识和研究,甚至根本不去认识和研究,一看界定它的词语,只要是被划定为后者,就是必须否定、抛弃、打碎的。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中,多党制就一定是民主的,一党制就一定是专制的。西方在确立自己的治理体制唯一正当性的同时,非常简单化地,也是极其粗暴地,把其他非西方的各种治理模式统统打上了专制的标签,看似泾渭分明,实则自欺欺人。

而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从远古起,中华文明所包含的各种文化,彼此之间并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甚至相互为敌的界线,由此产生的制度也不是排他性的。“天下无外”,中国人讲共生共存、互鉴互融,在两极之间求平衡,寻中庸,而不是走极端,奔绝对。

但是多元并不是杂乱无序，一体并不是千篇一律，比如儒家就讲尊卑有序、长幼有序。而且基本来说，在各个民族中，汉民族一直处于主体地位；在百家争鸣中，儒家长期处在主导地位；制度上大一统，下面也是小分散。所以说，中华文明有主体、有核心，但主体并不排斥其他，更不是形成对立，就像费孝通讲的差序格局，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内外虽有别，天下却无他。

这种多元一体的文化没有强烈的排他性，不会以排斥他者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更不会动辄把别人当作敌手。这是世界观问题，也是方法论问题，不是在价值层面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说这样好还是不好，也不是在利益层面玩零和游戏，说这样有利还是不利，既然天下无他，四海之内皆兄弟，那么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就都应该吸收，都要拿来。这其实是一种更高明的哲学和认识论，也是更开放的人生态度和世界眼光。不是那么天真幼稚简单化地处理我与你、我与他的关系，以为除了敌我没有别的，于是只好遵从丛林法则。在这个文明形态框架里，中国是几个大的文明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因为价值而与谁开战，或者因为宗教而灭杀谁的国家。

玛雅：中国理念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借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现代中国是按照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和框架建立的，并且加入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不可能完全排斥他的逻辑。

黄平：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形式被迫卷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从“林则徐”、“孙中山”们起，中国的志士仁人开始寻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这种寻求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别人能够“平等待我”，而不是要称霸，更不是要支配、主宰别人的命运。

新中国也是按照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建构的——现代国民经济、国民教育、国民健康、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国家防御，总之 everything is national（一切都是国族的）。但即使是按照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来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它背后的文化支撑仍然是多元、包容、开放的，而不是二元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包括看人看事看自己，何谓成功何谓失败，中国的认识论不是零和的，更不是丛林法则，好像不赢就一定输。虽然自 1919 年五四运动以来，以及 1949 年新中国以来、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所谓科学的东西进入越来越多，甚至有点过于“科学主义”——科学至上，但是在实践层面，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我们的习俗礼仪、为人处事并没有完全西化，还是按照几千年历史文化中的经验和智慧来处理邻里周边、上下左右的关系。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也正是因为没有被教条主义化；反而越是立足中国实际，越是立足自身的实践，就越能接地气，越能找到一个大多数人都接受也都能受益的制度安排。

玛雅：事实证明，这个制度安排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模式选择。

黄平：中国人这种认识论在古希腊其实也是有的，可是到了近代启蒙以来，尤其冷战结束后，西方越来越走到二元论甚至把它推向极端。在今天这个越来越多元的时代、越来越复杂的世界，二元论显然已经不够了。就像中国的水墨画或是西方的黑白摄影，它真正的奥秘是在黑和白之间做文章，最绝妙处是在黑和白之间无限的灰色和黑白之外更广阔的空间。就是说，它不是二元的，在你我之间还有他，左右之间还有中；中间有无数过渡，两端之外更有无限空间。

玛雅：因此就不是只有西方一种模式，而是若干可能的模式选择，所谓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用“水墨画理论”看世界，看国际政治，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西方，提出和谐世界的主张。

黄平：赤橙黄绿青蓝紫。在国际政治中，两极世界外面还有更大的“看不见”的世界。中西之外还有亚非拉，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绝不只是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不是说，我们是中国，外面是一个世界。中国本身就在这个世界里，是多元世界中的一元。

价值也一样。法国大革命讲自由、平等、博爱，后来西方又加上人权和民主，这可以说是一个价值体系。中国讲和谐、互助、团结、稳定，也是一个价值体系。这两个价值体系不是一定要对立冲突，按照多元、开放、包容的理念，我可以把你的东西拿来，你也可以分享我的东西。比如，法国革命讲平等，中国革命最基本的诉求也是平等，区别就在于，是不是一定要在认识论上变成二元的——非黑即白，甚至提高到所谓善与恶之间的选择。

还有一点很重要，即在多种价值中，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对它们的轻重缓急如

何排序。这不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好恶,而在于历史和总体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态。为什么1949 年北平和上海的人民那么热情地夹道欢迎解放军?其实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当时最重要的可能还不是两种命运的抉择,大多数人就是因为三年内战造成物质生活极度匮乏、通货严重膨胀,同时国民党政权又腐败不堪。这个时候老百姓自然就选择了共产党,欢迎解放军的到来。所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时候就看出来了。

这就是形势比人强。今天的中国也是形势比人强。总体来说,发展的势头在中国,即使速度有所放缓。中国道路的前景是光明的,也是因为今后几十年还会在这个势头上。

玛雅:势在这,国运在这,时间在我们一边。

黄平:这真的是势不可挡,谁想挡也挡不住。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刚超过日本时,我们都觉得,刚超过,且还要稳着呢。但是现在你看超过的程度,到 2012 年底,中国经济已经超过日本 38%;2014 年中国的 GDP10.2 万亿美元,日本 4.8 万亿美元,短短几年,我们已经是它一倍还多。所以,如果这个文化的生命力是巨大的,这个制度也是大多数人认同的,就没有理由说它就要崩溃了,或者不具有"合法性"。

改变舆论环境是一场无硝烟的"文化上甘岭"

玛雅:新中国 60 多年走了西方几百年的路,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十几亿人过上了小康生活。这不但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而且这背后的中国文化理念,对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这些事实应该明明白白地向我们的人民讲清楚,也要向世界讲清楚,改变国内外唱衰中国的舆论环境,扭转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

黄平:这个任务很艰巨,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能改变的,但必须从现在起就严肃认真面对。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不止是西方舆论、国际舆论,我们国内的舆论环境今天也是"西强我弱"。有些商媒和外媒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流或合谋的;有些官媒或准官媒的话语及其背后的"密码"也出了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在自觉不自觉中,把西方的话语和标准当成了我们的话语和标准。而一旦话语和标准出了问题,即使形式上这些媒体仍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舆论阵地在很大程度上也丢失了。

玛雅:不夸张地说,几乎已经"全面沦陷"。最近有个例子很讽刺。教皇方济各在美国访问期间发表言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在美国社会乃至欧洲引起强烈共鸣。而一向追捧西方的中国媒体这次却一反常态,批评美国人万众欢呼方教皇的狂热以及美国媒体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有评论说,全世界媒体都是左翼倾向,唯独中国媒体极端右翼。

黄平:有人说,中国很多大众传媒和在上面频频发声的"公知"、大 V 们自以为高明,其实是患了"集体智力低能症"。而正面舆论在某种程度上却是整体失语的,或者只是苍白无力地辩护、辩解,甚至干脆按照人家的口径编新闻、讲故事,从遣词造句到背后承载的理念。比如西方道路和西方模式,被当成是浩浩荡荡的唯一出路,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无他选择。即使是"中国不能走苏联亡国的路"这样的大道理,也被认为这只是说不能采用"休克疗法",但总的趋势还是要朝着西方去,无非是转轨的速度慢一点、步子稳一点。

历史虚无主义也很严重,各类媒体上出现大量影射性甚至颠覆性的段子、传闻和"小道消息"。其中很多是歪曲历史事实的,或者是用完全不同的标准和价值对待这些历史事实。这不光涉及一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不光是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黄继光、邱少云这些人物有没有缺点、该不该肯定的问题,更深层的是思想路线、价值标准的大问题。在传统媒体乃至舆论环境里,有些人说是"重写历史"、"戏说历史",其实是拿着人家的"资助"专门搞一些"细节"、"小节",用细节、小节的小真实来颠覆历史的大道理。最后结果就是,整个近代历史被颠覆,中国革命和中国道路的正当性被否定。

玛雅:国史专家李捷说,历史虚无主义虚无的不是历史而是价值,可谓一语中的。

黄平:学界和政界很多人都是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研究生。上世纪 80 年代在反思文革、反思中国

走过的弯路中，一方面获得了思想解放，甩掉了“两个凡是”，另一方面却又接受了新的教条、新的“两个凡是”：凡是西方的就是对的，凡是美国的就是好的；西方道路是人类社会的唯一归宿，中国无非是怎么接轨的问题。那时候整个的风气就是这样，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恨不得把孩子一块儿倒掉！

这个“风气”今天还在延续。很多人接轨心切，却对西方一知半解，对中国也一知半解。而且形成了认知上的两个倒错：对西方，只看到价值理念的一面，以为西方思想家的论著中所阐述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就是西方社会的真实写照；对中国，只感受到现实中不公平不满意的一面，甚至把几千年来先哲们的著述中所阐释的可贵价值看作是欺骗。这两个倒错是双重的，因为它的认识逻辑是相悖的，且还不自知其悖。中国今天的思想界，更别说传媒界，真正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有长期深入研究和思考，对中国国情和西方现实有严肃认真调查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玛雅：网上最近有篇文章，说“经过中国官场和高校腕爷的强有力的传送带，美国已经成功地在中国建立起意识形态领导权”。

黄平：意识形态领域西强我弱的局面恐怕长时间难以扭转。目前基本是靠传统的行政手段，开个会，发个文件，然后表个态，说得好听是落实，说得不好听是应付。这样解决不了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更解决不了理论问题和价值问题。

当代中国从哪里来、怎么来？下一步往哪里去、怎么去？中国与周边、与西方、与世界的关系怎么处理？怎么能做到既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义又确保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不受到威胁？共产党靠什么来确保战斗力、公信力即所谓的正当性、“合法性”？这些问题，没有积极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斗争”，光靠开会、发文件是不行的。这当中有缺乏自信的一面，也有官僚主义的一面，忘记了我们党曾经有那么成功的实践、那么丰富的资源。

玛雅：这样说来，当下中国迫切需要思想辩论，共产党需要新的“延安整风”。

黄平：真正的意识形态之战应该是积极而健康的思想斗争。既要表明立场，敢于亮剑，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真理越辩越明。过去 30 年、60 年、90 年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一路风雨走到今天，没有什么可回避退让的，也没有什么可胆怯讳言的。

这里也有个相信群众、相信青年的问题。事实上，越是把问题说白了说透了，大家越有鉴别力、判断力。尤其是青年人，今天 80 后、90 后的信息、视野，他们对时代脉络、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的基本感受在这儿，哪那么容易就被对手忽悠了？就被“颜色革命”了？

玛雅：80 后、90 后是在中国快速上升时期成长起来的，国家的强大给了他们一种支撑，给了他们自信。不管是通过电视、互联网看世界，还是走出国门看世界，他们的目光都是平视的，是挺胸抬头走出去的。

黄平：中西思想交锋也一样，需要文化自觉和自信。如果我们不能有理有利有节地正面交流、交锋、交战，那就只能应付对付、应急应景，把这次访问搞过去，把下次论坛弄过去。有些时候甚至是求助、求饶，不断解释说：我们没有“违规”，我们做的其实和你们是一样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因为中国自己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办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对当代世界的思想问题就先搁一边了，不争论，一心一意谋发展，还有所谓“闷声发大财”之说。直到今天，连所谓一流的外交官很多时候也是只讲中国的事，很少讲世界的事。即使讲，也只是重复别人的话，不会按照自己的理论去讲世界的事。而西方却当老师当惯了，永远是既出题又改卷，还总说我们不及格。

为什么我们不能讲世界的事？当年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中国是要发声的，全世界也都是认真听的。中国今天这么大的经济体，这么快的发展速度，全世界都在关注我们，为什么世界其他地方发生事却常常听不到中国的声音？这不是因为我们“自私”，只管自己的事，而是缺乏自信，不知道该不该发声、如何发声。甚至连主流媒体关于世界局势的报道，用的资料和说词也基本是外媒的，主要是西媒的。

坦率说，要在文化、思想、理论、舆论上建立阵地、守住阵地已经很难。而一旦失守，想要打反攻夺回来就更要练好内功，否则是打不了也打不赢的。而练功必须是真刀真枪实战演练，而不是在课堂上在书本里，更不是能说几句外语就行的。

共产党夺取胜利是建立了意识形态制高点

玛雅: 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国力远不及今天,意识形态却是“出超”的。现在我们国力那么强,在世界上却没有相应的话语权。

黄平: 除了现象层面无硝烟的“上甘岭”,在理论层面也需要认真思考。我们本来是有丰富理论资源的,但是由于这些年来片面地理解“不争论”,也由于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个人利益,有意无意之中把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理论资源给扔掉了。现在的舆论环境,甚至整个思想领域,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国际国内经济社会环境下保持定力和守住阵地。用马克思的话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化。当我们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后,舆论环境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化? 舆论环境变化以后,我们怎么还能用老的方略来守住阵地? 如果老的方略不行了,新的方略是什么?

玛雅: 当务之急是展开思想辩论,澄清道路选择上的错误认识,打赢这场“文化上甘岭”。

黄平: 这确实又不是简单的机械决定论。列宁讲,没有革命理论,就没有革命行动。当年的井冈山道路、延安道路是创造了奇迹的。井冈山时期条件极其困难,经过长征到了延安以后也非常困难,既没钱也没技术,装备很差,补给也没有,住窑洞、点油灯……但是就在那样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产生了《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当代经典。延安整风时期,除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这三篇著名文献。

玛雅: 2015 年夏天去延安,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我一直在心中万般感慨: 他当年在那盏昏暗的油灯下是怎么看到新中国的光明前景? 共产党究竟是靠什么力量从山沟里走出来,让中国革命的胜利从不可能变为可能?

黄平: 共产党首先解决的就是思想建设的问题。1929 年古田会议就是解决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问题,“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的时候就开始实行了,到了延安又进行整风。在一个连现代工业几乎都没有,无产阶级也几乎没有的社会,通过不断的思想建设,党在抗战胜利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就是今天所谓的话语权问题。

继列宁之后,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文化领导权,是指人民大众对基本制度及其背后的价值自觉自愿的遵从。他说,如果无产阶级只解决了政权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问题,肯定是站不住的。但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问题,仍然不能解决正当性问题。葛兰西讲的这个问题,我们党和军队在革命年代曾经做得炉火纯青。这就是被毛主席称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把民心争取过来了,包括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追随,以及中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得民心者得天下,真是一点不假。国民党丢了政权败退台湾,军事上兵败如山倒是一方面,民心上水可覆舟是另一方面。

玛雅: 哈佛大学教授、《安源: 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的作者裴宜理说,共产党在创建之初就发明了独特的动员民众的方法。这也给这个党留下了遗产,使之可以依存其上很久。

黄平: 现在有一种说法是经不住历史检验的,就是说,一定要有硬实力,才会有软实力。延安那会儿有什么硬实力呢? 共产党从井冈山到延安一路下来,恰恰不是先有了硬实力才发展起软实力,诸如此类的命题是经不起历史事实和逻辑理论检验的。

这个问题,我曾经斗胆跟一些老前辈争论过。他们当时在大力推动改革开放,令人十分敬佩。但是当中央说“发展是硬道理”,有些地方给解读为“赚钱是真本事”,然后又引申出另外一句,叫“财大才能气粗”。如果照这个逻辑,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人民军队的历史,就都没法解释了。共产党当年风风雨雨、破破烂烂、跌跌撞撞,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一步一步走下来,最后走到北京,走出一个新中国,这中间从刚开始到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有什么硬实力?!

玛雅: 共产党当年建立了意识形态制高点,从而战胜敌人、夺取政权,也确立了自己执政地位的正当性。今天要维护这种正当性,也要建立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黄平: 但是在今天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中,在没有硝烟的“上甘岭”上,我们有时候连游击战也没做到。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最近的时候; 但另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层面,老实说,我们还在延安,还是西强我弱。在世界范围内面对西方的舆论压力,我们目前还只能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要抓住文化领导权。同时越要看清楚,究竟什么是可以不争论的,什么是想绕也绕不开、你不占领就会被他占领的。比如发展道路和国家安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仅要积极争论,还要敢于亮剑。

如果这个不解决,只是有钱有设备,用钱和设备来搞文化“走出去”,不论搞得多么绚丽多彩——包下一个音乐厅、染红一条著名大街,不但花了钱,可能效果还适得其反。现在一些官方人士在国外讲话,不但语言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而且不断地认错、不断地道歉,甚至不断地求饶: 我们没有侵犯人权,没有用犯人器官做试验,没有迫害少数民族,也没有破坏少数民族文化……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标准已经是人家的了。裁判也是人家,你再怎么解释、说明、求饶也没用。甚至越解释人家越不信,越求饶越被他看不起。

玛雅: 有评论说,中国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战场上,把自己绑定在一个“多挨打少还手”甚至是“打不还手”的尴尬境地。

黄平: 看到问题之后要问一句: 我们今天能做什么? 为国分忧、责任担当是一方面,思想解放、与时俱进是另一方面。奇迹是可以创造的。鲁迅当年就创造了奇迹,整个白色恐怖下,一个人、一支笔。毛主席后来讲,鲁迅是一面旗帜。在今天世界舆论环境西强我弱的条件下,对于思想者的力量,我们决不能小视。媒体,尤其新媒体,一定要用新的语言、新的方式去表达,传递正能量。对 80 后、90 后年轻人,呆板、枯燥、生硬、僵化、教条的一套说辞再也不能要了,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玛雅: 习近平上任后,语言表达比较“接地气”,拉近了和群众的距离。

黄平: 改变文风确实很重要。再一个可能走出舆论困境的途径是,直接诉诸群众,述诸青年。如果能把广大青年聚集到中国梦的旗帜下,亿万热血青年和爱国志士都跟着干,就不愁没有力量。这就需要特殊的方法、造就特殊的人才,甚至在新的时代重上“井冈”、重建“抗大”,鼓励有志青年去农村,去基层,去边疆。这个不是不能做,也不是做不到,哪个时代不是好男儿志在四方!

当然,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就解决,何况国际舆论大环境是这个样子。但如果问题已经看准了,就得一点一点做,一步一步走。一开始也许只是很少人参与,但是先要有一些思想和舆论的平台。这些平台,不管是传统媒体或其他新形式,应该开展真正的思想探讨。无所谓参与者是官是民,地位是高是低,找出真正的问题,认真严肃地讨论、争论、辩论,而且用新的语言、新的文风、新的气派。这样就能逐渐改变八股风气和由此形成的正面舆论失语的状况,改变文化舆论领域游而不击或者无力还手甚至一味求饶的窘境。

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人民主体性

玛雅: 回到中国革命话题。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必须遵循六个原则,即“六个坚持”。其中第一位的,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中国革命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来看,如何理解人民主体地位问题?

黄平: 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的主体性。如果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程画一个路线图,它先是通过政治革命,尤其是武装斗争,来解决亿万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当时条件下,要通过革命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亿万普通民众的参与,只靠少数精英的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那时候中国的普通民众是谁? 他们在哪里? 由于中国当时还没有现代大工业,也没有大批城市无产阶级,有的主要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乡村的亿万农民,那革命的主力军能是谁? 只能是广大农民群众。

但是,农民在旧时代不但是一盘散沙,而且没文化,更没有政治意识。要使他们成为革命的主体,就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共产党扎根农村,和群众打成一片,建

立起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并且逐步发展出一整套群众路线理论。群众路线与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相并列,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群众路线不仅是工作作风,也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

玛雅:毛主席当年用种子和土地来比喻党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共产党要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

黄平:正是因为这个逻辑,延安时期讲,看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最终要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结合。这话听起来很绝对,背后所反映的既是立场和感情,也是中国革命的逻辑。不遵循这个逻辑,中国革命就无法成功。

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进入这种新型政党、新型军队,把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小农改造成高度组织化、具有高度觉悟和牺牲精神的现代人,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小米加步枪"能够夺取全国胜利,是因为农村来的普通士兵政治觉悟高,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同时也因为他们是高度组织化的,其程度甚至超过了马克思理想中的城市工人阶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最具有组织性,中国的革命斗争如此残酷、如此惨烈,武器装备如此之差,医疗救护用品根本就谈不上,队伍长年在山沟里,甚至还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如果没有高度的组织和觉悟,这样一支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早就鸟兽散了。

这是一次革命性的创造,也是一个奇迹。通过高度的组织和严密的纪律,也通过整风学习、思想教育,把普通农民造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坚强战士,后来成了新中国的组织者、管理者和建设者。

玛雅:新中国成立后,群众路线作为党的优良传统延续了下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制度优势。虽然过去 30 多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群众路线被淡化,甚至被淡忘。但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这个制度优势积累下来的红利。

黄平:的确。1949 年以后再一次把亿万翻身农民组织起来,用今天的话说,使他们成为具有生产力、竞争力的劳动者。1979 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外国资本为什么愿意来中国投资?要是没有这样一支几亿人有组织的劳动大军,他们来投什么资?这个劳动大军可不只是便宜,要说便宜,非洲的劳动力不是更便宜吗,为什么来中国?

毛泽东时代奠定了两个基础,一个是造就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劳动技能的现代生产大军,再一个是创造了从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到独立的工业体系,还有交通运输、教育、医疗等一系列基本条件。1979 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不仅是百川归海,而且是万事已俱。就连人均预期寿命都从 1949 年的 35 岁到 1979 年的 68 岁,30 年翻了一番,几乎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腾飞,这样的基础是不能被忽视的。

说起毛主席和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确实是我们后来者想绕也绕不开的一座大山。中国能有今天的成就,既得益于改革开放,也与他和他那代人的坚强领导和不懈努力奠定的坚实基础分不开。毛泽东那代人留下的财富,包括精神财富,不论你喜欢不喜欢、情愿不情愿,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在不断汲取、不断总结、不断继承。对我们下一步往哪走、怎么走,对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其意义和作用都不可估量。所以说,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到后来的新中国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其实是三个 30 年的延续。所谓历史的延续和继承,在当代中国,就是这三个 30 年的延续和继承,也是对这三个 30 年的继承和发展。

对共产党来说,群众路线仍然是根本性的

玛雅:高山仰止。毛泽东和他那代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或者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他所开辟的那条道路,最值得我们珍惜的是什么?

黄平:毛泽东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坚持人民的主体性。你看他的文章,从早年《民众的大联合》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再到前面说的延安时期那些很成熟经典文献,都一以贯之体现了这种人民主体性。一直到他晚年,不论当时党内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多大的问题,他都总是站在人民一边、群众一边;即使政策上有错误,后果也很严重,站在

群众一边的立场始终没有变过。

中国革命年代创立的群众路线，首先一点就是人民，主要是普通农民。他们是历史的主人，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当年毛主席的话我们都记得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玛雅: 10 月 12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 “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表述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以民为本的思想。

黄平: 客观上说，今天的中国与毛泽东时代已经完全不同了。时代发展了，历史进步了，农民正在减少，城市正在扩大，知识、文化、科学、技术、信息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 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千变万变，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民仍然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特别是普通群众，包括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 “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经济生产中的一个 “要素”(其他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 ，也不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 “分子”(还有其他分子，比如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 ，他们还是创造财富和维系社会的基本力量，是改革与创新的主要动力，是中国今后往哪走、怎么走最重要的依靠力量。

玛雅: 所以对共产党来说，人民群众永远是执政基础和力量源泉。在今天，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仍然是根本性的。前面你提到，群众路线既是工作作风，也是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在你看来，今天回归群众路线，最重要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黄平: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既是政治路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也是组织路线——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还是认识路线——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当然也是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

十八大以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先从作风和纪律着手，首先是干部不能违反八项规定。但是群众路线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作风问题，它首先是政治路线，就是人民立场、人民主体。任何时候都要坚定站在最广大人民一边，这个立场从来没有动摇过。这是共产党能够创造中国革命奇迹最重要的原因。那时候，党没有区别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特殊利益。而在今天，如果政府和投资商开发商，甚至外国资本沆瀣一气，对待工人只是资本的逻辑，只是雇工关系，人民就不再是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人了。这时候他就被当成了负担——政府财政的负担、社会保障的负担、医疗养老的负担。

玛雅: 中国今天工人农民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多人不会说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已经没有这样的政治意识。

黄平: 这是很大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政治路线首先就是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得到确立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必须在一次分配中确立劳动者的地位，包括劳动产权，而不是只有资本才有产权。不能是在二次分配中如何做到公平一点，把更多的预算和投入用于低保、用于民生，那充其量是社会民主主义，在不动摇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二次分配来缓解劳资矛盾和贫富差距，维护秩序，稳定社会。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以社会主义为导向，所以人民的主体地位是基础。

与之相关，群众路线也是组织路线。就是说，不论是党组织还是国家机构，人民群众在里面的份额是多少、发言权是多少，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应该成正比。同时，把工人农民和科研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重新组织起来，使他们成为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实现中国梦伟大目标的主力军。中国道路的一个奇迹，就是把曾经一盘散沙的贫苦农民组织起来，变成自觉的革命战士。革命胜利后建设新中国也是走的这条路。因此，对于共产党来说，把人民组织起来是一以贯之的宝贵传统。

在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背后，是认识路线的问题。毛泽东的《实践论》一个最重要的观点就是，一切知识都是从亿万群众的实践中来的，而不是从个别人的脑袋里来的。他当时批评知识分子的那些毛病——自以为是，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今天对照一下，问题不是都还在吗? 所以，群众路线首先是政治路线，也是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由此派生出工作作风。这四个方面一脉相承、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整体。

人民参与是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

玛雅:群众路线的精髓是人民主体性。今天回归群众路线,如果只是停留在整顿作风上,就缺了一个核心。

黄平:从作风和纪律着手是对的,先解决显而易见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反腐倡廉无疑是力度最大也是成果最大的领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教育,现在已经从落实八项规定逐步深入到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政治底线。但最后还是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而不仅仅是不能碰、不准碰、不敢碰的问题。

中国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人民主体性和因此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认识路线,而只是在姿态上、形式上回归,那还没有激活人民群众作为国家主人的那种力量。那种力量以前叫"精神原子弹",就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群众力量是无穷的。最近这几十年,1998 年长江抗洪抢险,还有后来抗击非典、抗冰雪灾、汶川抗震救灾,都展现出这种人民性。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有灾有难了,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共同担当。喜庆的有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建国 60 年大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那种普天同庆、万众欢腾,我参与、我自豪的气氛,体现出"人民是主人"的精神风貌和政治力量。

玛雅:这种人民主体性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相得益彰,是中国道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黄平:十几年前我在西南贫困山区做调研的时候,遇到发达国家的专家来这里搞"扶贫"。旁观者清啊,他们一来就发现,西南山区有一个现象是他们在其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看不到的,就是这里的男女老少,一个个白天黑夜都在干活!有位外国专家十分感慨地对我说,普通老百姓都如此肯干,这个社会不发展起来没道理。

当然,光肯干还不行,还要政策对。用老百姓的话说,叫"人努力,天帮忙"。我觉得,这个"天"就是政策,就是制度。中国发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是从实践来、从基层来,从群众中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实践都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比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南方的乡镇企业、大批的农民工进城。人民群众参与其中,才有真切的获得感、喜悦感和主人翁感,才有对国家现状的认同和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道路的最大特点,就是亿万人民迈开脚步,自己走出了这条路。毛主席当年的两句诗,放到今天仍然是真实写照"遍地英雄下夕烟','六亿神州尽舜尧"。

反之,如果我们发展经济只走精英路线再加资本逻辑,忽略工人农民,忽略普通民众,那一件事、一座桥、一条路的"政绩"还是可以干得漂漂亮亮。但那是用钱堆出来的,或者是现代技术做出来的,包括用多媒体搞得非常炫丽。但如果普通人民不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就不会参与,不会珍惜,更不会保卫。

玛雅:而且用钱能堆出多少呢?中国 8 万多个水库大部分是在新中国前 30 年修建的,如果在今天用给钱的办法来修,那得花多少万亿?堆得出来吗?

黄平:只用钱堆肯定不行。更糟糕的是,这样的"繁荣"很可能是虚假的、虚胖的。如果人民性、群众性缺失,亿万民众只是当看客,那即使 5 年一小庆、10 年一大庆,大家都不支持、不参与,有些人还成心对着干,那怎么办?单靠加强警力来维持秩序吗?所以,人民做主、人民参与、人民共享的问题,是中国下一步坚持可持续发展道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丝毫不亚于环境、资源、技术层面的可持续性。

再来看中国革命这个奇迹。从 1919 到 1949 年的历史,是无法用金钱的逻辑来解释的。如果只是金钱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加上技术和装备的逻辑,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早就该散伙了。面对日本侵略者也早就该缴械投降了,或者"识时务者为俊杰",走汪精卫路线了。如果真是那样,就没有今天的中国了。

玛雅:你说的,我很有共鸣。在延安参观毛主席的窑洞时我最大的感受是,从当年"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到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不愧是一个伟大的党,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党。共产党想要干的事,就没有干不成的。

黄平: 确实如此。这样一个政党,第一它的权力来自人民,老百姓用脚投票,还在夺取全国胜利以前就已经赋予它这个权力。第二,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一脉相承至今,不但有组织力、号召力、规划力和执行力,而且有整体和长远的战略视角。第三,共产党本身具有创造性,从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开始,如此成功地把普通农民组织起来,塑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有没有问题和错误呢? 当然有。有些问题还很严重,有些错误还很惨痛,教训也很深刻。但整体来说,新中国能够在那么差的经济条件下,用 30 年时间就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全国农村建起水利灌溉系统,还使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甚至改变了文化生态和社会道德状况,这一切说到哪儿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改革开放这 30 年,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奇迹: 不仅连续多年实现了高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的人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步入了小康。

相比西方发展的历史,要说外部条件,我们的外部条件不知差到哪去了。西方三百多年的发展,全部人口加起来还不及我们的人口规模,花了那么长时间不说,其间除了内部贫富分化、社会动荡、政治革命,甚至国内或国家间的战争,还有那么多殖民、侵略,对大自然和各种资源也是肆意掠夺和破坏,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中国一上来几乎全都是瓶颈,环境、生态、资源、能源、耕地、淡水……各种硬约束如此之多之重,却在如此短的时间以如此低的代价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

这样来看,邓小平当初讲政治改革的那些话确实不是托辞,而是多年的经验和智慧之谈。一方面体制和机制要改革,解决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问题; 另一方面不能把我们好的东西改掉了。尤其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不但不能改,还必须坚持。

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玛雅: 在新的 30 年,共产党应该如何发扬传统,保持优势,带领中国行稳至远,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

黄平: 这涉及三个方面的一致性,即人民幸福、国家强盛和社会主义目标。这三方面能否把握好、处理好,涉及下一步中国道路能否走稳走顺,甚至走出世界意义。

首先要讲国家强盛,因为虽然中国不想树敌,更不想称霸,希望能够互利合作、共赢共享,但是有些人总要把我们当敌人或对手。在外部还有虎狼的情况下,就不能不讲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强盛。否则 13 亿人,如此少的耕地和水资源、油气资源,要是不讲国家利益而只有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中国社会早就弱肉强食、互相残杀了。如果社会分崩离析、战乱不断,还有什么个人利益可言呢? 最遭殃的其实就是无数的个人,从无地到无业再到无家,流离失所,沦为贫民、饥民、灾民、难民。

玛雅: 所以说,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国哪有家,这话千真万确。

黄平: 中国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大国,环境、资源等硬约束如此之强,外部条件如此之差,还有人不愿意看到我们发展繁荣,试图从软的硬的方面遏制我们。不论过去 30 年、60 年、90 年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如何艰难、如何伟大、如何成功,别人真要联合起来打断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并不是不可能的。建一座房子要花很多的时间和投入,拆掉它就是一下子的事。而要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文明复兴,这比建房子不知道要难多少倍,但如果要破坏它、打断它,可能就是毁于一旦。我们讲三个自信,是自己必须具备的内在素质,从外部来说,则要有一个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在内在素质和外部环境之间,必须确保一个大前提,就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所以,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要摆在前面,否则中国分裂成七大块,还谈什么经济发展、人民利益?

但是讲国家利益又不能以国家之名,把人民变成可怜虫。如果人民不再是主体,不再是社会的有机组成和重要力量,那国家也强盛不起来。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如果亿万人民不觉得这是自己的事,他不是参与者,而只是一个看客,或者是被动的受恩惠者,那国家安全也得不到保证,国家利益也落不到实处,哪怕 GDP 再高,设备再先进,国家强盛也是空的。

玛雅: 有句话叫“筑梦者,想非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如果十几亿人民不能成为筑梦的主体,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或者只是实现少数人的“美国梦”。

黄平:这就回到你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中国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人民为动力,以人民为目的。以前有句话,农民的孩子知道是为谁扛枪为谁打仗,他甚至可以牺牲生命。这是共产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最后取得全国胜利最关键的一点。要是比资金比装备,怎么比都没优势,那还打个啥呀?唯一的优势就是扎根人民,和人民融为一体。毛主席那段话是在井冈山反围剿的时候写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也是靠这个,军民一致,鱼水情深。淮海战役甚至有"老百姓用手推车推出来的"之说。新中国初期也一样,年轻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心甘情愿奉献青春,觉得这是自己的事,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和主人翁地位。

今天,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人民群众首先是劳动生产者,是财富的创造者。之所以说群众路线是个政治问题,就是因为人民的主体地位必须确立。而且是在一次分配中得到确立,而不仅仅是在二次分配上做文章。这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税、多给点少给点福利的问题,因为普通群众或劳动大众不应该是可怜巴巴的被救济者和福利领取者。如果那样的话,就算做到头,无非也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而如果做得不好,国家和人民还会处于疏离、分离、对立的状态。人民不会把国家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包括一些大事要事,国家做起来那么坚决,可如果人民只是在一旁看戏,那就不可能持久。国家离了人民,即使 GDP 再高也是虚胖;人民离了国家,即使收入再高也是散沙。当把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摆正了、统一了,才有第三个一致性,就是社会主义目标。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人民主体地位和社会主义不是同步的?

黄平:人民主体地位和国家根本利益,这两者统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只是民为本,那中国几千年前就有了;如果只是国家强,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多数都不是社会主义。当我们达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度一致时,那已经是一个崭新的中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只有当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单一国家在亚洲和世界的崛起,更不是一次替代美国霸权的"权力转移",国际层面的社会主义才有可能。

历史上,一些国家试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比如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后来西欧北欧试图通过改良——福利国家、二次分配,来缓解贫富差距。现在由于全球化、信息化,也由于革命时代已成为历史,福利制度又"先天不足",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很可能只有通过中国道路的成功及其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才能在新的层面重现。而这,恰恰又是与中国原本就有的和谐、大同乃至天下观念不谋而合的。所以,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是坚持中国道路和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归宿,也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命运,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必然要求。

今天来看,"两个一百年"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已经近在咫尺,第二个百年目标也是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这么接近过。行百里者半九十。也许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越是临近登顶就越需要耐力、毅力和智慧。而只有在登上顶峰之后,才能一览众山小,才能骄傲地说,社会主义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玛雅:从这个意义说,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选择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球范围来看,整个世界还是西方在主导。但是不可否认,在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领域,中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黄平:是的。事在人为,在全球领域,改革旧秩序,探索新秩序,管控风险,练好内功,这些事情中国不但已经在做,做得也真不赖。放眼世界,中国确实称得上风景这边独好。

中国在,我们的希望和信心就在

玛雅:这两年中国经济下行,民生问题也很突出,不少人感到失望,开始失去信心。你能保持乐观态度,主要支撑是什么?

黄平:看问题不要只看一时一事,也不要只看表面和个案。从历史脉络看,中国确实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因此这 10 年,即从十八大到 2021 第一个百年,是很关键的 10 年。中央现在第一刀砍在反

腐上，迈出了前所未有的一步，人民拥护，举世瞩目。治党之后，接下来就是治国。反腐是惩恶，同时还要扬善，让想干事、能干事的人能够积极进取，积极作为。要把对国家有担当、对人民有奉献、对未来有信心的人，放在最需要的地方和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和潜力。特别是对爱国青年和有志之士，要积极培养锻炼他们，同时给担子、给压力，使之经得起风雨见得起世面，成为国家的脊梁和社会的栋梁。

玛雅: 对目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你怎么看?

黄平: 我觉得不妨换个角度看。第一，经过这么多年的大发展、高增长，进入中高速发展期是正常的。只要能保持中高速发展 10 – 20 年，就是很了不起的。第二，过去的发展模式片面追求 GDP，带来了很多弊端。现在随着经济放缓，正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模式，发展生态、民生等。第三，适当放缓使得我们有可能慢下来、静下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改造我们的学习，调整我们的战略，“严肃认真地思考”。

比如，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本质要重新认识。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识西方先进发达的一面多，随着苏东解体、冷战结束，原来帝国主义的那套好像都不存在了。2008 年以来世界核心地带发生了危机，不是周期性、政策性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因此原来的那些西方迷思就值得重新思考了。

玛雅: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还是好运。我们问题多，他们问题更多; 我们犯错，他们错误更大。

黄平: 对，国运在，势头好。这 10 年是关键，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过的那两点: 第一在政策层面，包括战略和决策层面，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 第二在经济层面，包括金融和能源、信息，不要整个被资本和西方拿下。如果犯了颠覆性的错误，或是社会、经济、信息被整个拿下，那你再怎么样也回天无力了。所以要有战略定力，头脑一定要清醒。

玛雅: 你曾经说过一句话，给我印象至深。你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底气和信心”。

黄平: 我现在仍然坚信这点。再有 20 – 30 年，随着经济继续发展，中国将更加强大，更具有世界影响力。现在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重大战略机遇和挑战，对外仍然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仍然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要坚持求真务实、长期艰苦奋斗，各方面的工作才能做好，经济的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的，还有科技、信息、军事，能源、环境，都要做大做实做强。同时要解决好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问题，整个社会综合治理、国家制度建设也要跟上。在话语权上，要表明立场、敢于亮剑，坚定捍卫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建立中国文化自觉和自信。同时要用新语言、新方式、新途径，改变呆板、生硬、枯燥、僵化、教条的八股。在对外交流、交锋中，既不可自说自话、闭门造车、自我吹嘘，也绝不顺从、求饶、缴械投降。今后的 10 年 20 年 30 年，只要我们沿着中国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到“两个一百年”中国梦实现之日，中国将不但站得更稳，也将站得更高，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也会更加受到世界的尊重。

(责任编辑: 余小江)